

现代国际关系译丛

14

当前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改革

本社选编



时事出版社

现代国际关系译丛(十四)

当前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改革

本社选编

时事出版社

1987年

现代国际关系译丛

现代国际关系译丛(十四)
当前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改革
本社选编

*
时事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万寿寺甲2号)
北京时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 字数: 121000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009-004-3/D03 印数: 1—5000
统一书号: 3225·045 定价: 1.1元

编者的话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苏联开始了新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他要求理论家、经济学家就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探讨，鼓励他们发表各种意见，以促进改革。本辑基本上选译了1986年一些著名的政治理论家、经济学家和官方人士在苏联主要报刊上发表的有代表性的文章和谈话。这些文章和谈话涉及体制改革的各个方面，对我们研究和了解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译文采取全译、节译和编译三种形式。

1987年1月

目 录

向管理工作的根本改革方向前进	A · Г · 阿甘别吉扬 (1)
经济生活的核心 (阿巴尔金答记者问)	(7)
经济发展中的社会公正原则	T · 扎斯拉夫斯卡娅 (18)
加速构想中的商品货币关系	B · 库里科夫 (29)
计划和主动性：问题和解决办法	B · 基里钦科 (45)
完善苏联经济刺激体系	Л · И · 阿巴尔金 (52)
自筹资金是一种合理的经营方法	B · 莫斯卡连科 (68)
苏联农工联合企业改革的先进典型	《真理报》编辑部 (80)
工资制度改革 (格拉德基答记者问)	(86)
完善消费价格	Д · М · 卡扎克维奇 (93)
加强银行对经济的影响	B · В · 杰缅采夫 (101)

- 用于企业改建的贷款 Ю · 格林科 (109)
- 改革条件下的干部工作制度 Ю · А · 罗森包姆 (112)
- 社会主义人民自治 И · 伊林斯基
И · 罗日科 (120)
- 完善社会主义阶段的苏维 埃国家 И · П · 伊林斯基
Н · В · 切尔诺戈洛夫金 (128)
- 苏共二十七大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Д · А · 吉利莫夫
Н · Г · 柯别茨 (136)
- 苏共二十七大谈党的进一步发展 Ф · 彼得连科 (144)

向管理工作的根本改革方向前进

A · Г · 阿甘别吉扬^①

社会经济发展的新任务要求深刻改造计划与管理体制和整个经营机制。戈尔巴乔夫同志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说：“当前的形势是，不能局限于局部的改进，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革。”这指的是建立有助于更充分地体现社会主义经营形式优越性而完整、有效和灵活的管理体制。

党的二十七大文件深刻地论证了改造经营机制的任务和基本方针。如同任何事情一样，首先，必须明确提出新的经营管理体制的目的。第一，这种体制必须真正使我们整个生产服从于社会需求和满足人们的需要。这就是说，必须清除生产单位强加于消费者的做法，消灭供应不足的现象，做到供货单位的工作真正符合消费者的需求和利益。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能够以较少的资源来满足社会需求。要知道，今天有许多资源白白地浪费了。生产了许多实际上无用的产品，这些产品要么闲置不用（如相当一部分机床或汽车），要么长期堆放在仓库、货栈、商店里（如某些物资）。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这个问题越来越尖锐并具有越来越大的意义。例如，最近十年来物资流动资金增加的速度比社会总产值快得多，并大大超过了标准。设备的大量闲置和使用不当导致基金产值率大幅度下降。

与第一点密切相关的改革管理的另一宗旨是，整个经营体制要以提高效率和质量、加速科学技术进步为目标。为此，必须首

① 苏联科学院院士。

先从国民经济的角度来评价生产结果。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使价格体系符合社会必要消耗，用价格来核算产品的国民经济效益。由此可见，充分计算费用是重要的，不仅要计算直接的和清楚可见的费用，而且还要计算在国民经济其他环节上与吸收更宝贵的资源投入生产、吸收补充投资有关的费用。但是我们认为，只有在各种资源都实行付费办法的情况下，这种完全的费用核算才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计算生产者活动的全部国民经济结果以及把这一结果同全部费用对比一下，就会产生总计指标，能够客观地判断生产效率。我们要补充说明，这是经营机制无故障运行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却是一个还不充足的条件。之所以不充足，是因为必须把企业相应的劳动集体的活动结果（这是一个方面），同集体赚得的企业的劳动报酬、奖励、文化生活福利（这是另一方面）直接联系起来。

在新的经营机制中必须做到：不是以国家为代表的整个社会对某个劳动集体的无效工作成果负责，而是这个集体本身对未能利用的潜力和条件负责。相反，由于该企业努力劳动，则应将它获得的相当大一部分额外效益留归该企业，以刺激它进一步改进工作。众所周知，现在的情况并非这样。这又是怎么造成的呢？干得较好的人不一定完全能得到较高的工资收入，得到更好的住房，等等。既然计划工作多半以已达到的水平为依据，优良的结果就似乎常常混合于中等结果之中，对信得过的供货单位提出的任务越来越重，而给它们规定的工资很少能增长到劳动生产率提高的1%。对额外降低燃料和材料费用者很少给予奖励，对节约使用固定生产基金者则完全得不到鼓励。必须记住，从生活条件看，那些干两班的人所处的境遇比只干一班的集体要坏些。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这种状况应当彻底改变。这样变化的原则是很明显的：谁取得优异成果，谁就应当受到更多的奖励。

最后，改革经营管理体制的第三个方面是发扬经营民主、吸收

劳动者参加管理、鼓励首创精神和社会主义进取精神。党的二十七大建立劳动集体委员会的指示对于解决这些任务有着巨大意义。这样的委员会能够更有效地实现相应法律规定的劳动集体的权利。

可见，改革具有多方面的性质。

当然，这样彻底地改革管理，用搞一次运动的形式是不能实现的。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它要求经过多年深思熟虑和有条不紊的工作。众所周知，这样的工作已经开始了。随着准备工作的进展，正在建立机构，以管理一批按特性相互联系的部门，这就是国家农工委员会，机器制造局。还将提出建立类似机构的任务，以领导建筑综合体。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已经提出了共同管理几个交通运输部的建议。

新的经营方法，1984年初只在为数不多的部实行，现在每两个工业企业就有一个较广泛地采用了这种经营方法。

我们认为，对已进行的大规模试验不应作单一意义的评价。这种试验选定了正确方向，因为它是以扩大生产联合公司与企业的权力和自主为目标的。总的说来，试验结果是好的：供货计划完成情况得到改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有所提高，成本开始较快下降。但这一进展在效率和质量方面是不彻底的，就其规模而言，也不完全符合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任务的要求。归根结底，这同试验过程中实行的新的经营方法有关，因而决不能称之为彻底改革。其实，这种试验早在1983年在其他条件下就开始了，当时还没有十分尖锐地提出加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任务，还没有提出彻底改造社会生产和从根本上加快科技进步的任务。因此，过去试验的条件是不明确的、不彻底的。企业的自主性和它们的权利虽有所扩大，但并未达到要求的程度。对企业和生产联合公司繁琐的监督在许多方面还依然如故，以前许多妨碍首创精神和进取精神的指令和规章仍在继续起作用。

新的经营方法是脱离集体组织形式和劳动刺激的。在物资技术供应上没有任何新的方法，而这对企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领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企业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对鼓励提高质量和技术创新也缺乏刺激因素。1985年虽然加强了这些刺激，但还没有成为试验工作必不可少的方法。因此，一方面改变试验方法的企业在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另一方面，许多经营单位试验的结果又令人失望。的确，得到的结果是不相同的。在真正创造性地采纳新的经营方法并热情地付诸实施的地方（例如白俄罗斯轻工业部），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都比其他单位有显著提高。总的来说，试验的经营方法尚未使劳动集体处于二者必择其一的境地：要么工作好些，生活好些；要么工作照旧进行，生活得不到改善。目前确有一些工作马马虎虎，而生活反倒不错的人。许多人比较喜欢走这条道路。1985年，在那些试验工作已经进行到第二年的企业，有一大批工作得不如第一年，当时它们在供应和运输服务方面还享有额外优惠，而且受到很多照顾。

因此，目前正在工业中继续探索更有效的经营管理形式。伏尔加汽车制造厂和“苏梅”机器制造联合公司进行的试验在这方面就具有很大意义。这两个单位已经改成依靠定额分配利润来筹集资金，并被赋予更大的自主与权利，同时加强企业对最终成果的责任。

新西伯利亚城各企业中有46个车间和工段进行了另一种试验，改用集体组织和劳动刺激形式，结果收效良好。在这些单位，参加集体承包形式的除了工人外，还包括工程技术人员。这里发生了比较彻底的变化。这些车间和工段在试验的一年内，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4%，比过去几年以及比还未改用新方法的同类车间和工段高出1.5~2倍。凡是工作安排得好而和谐的地方，人们就真正爆发出首创精神和劳动积极性。一年内，劳动生产率提高25~30%。由此可见，对集体承包原则必须给予更加密切的关

注。在实现经营管理彻底改革时，整个刺激制度都可以适当地以这些原则为基础。目前少数已完全改行集体承包制的企业和生产单位的工作经验肯定了这一结论。《经济和工业生产组织》月刊曾介绍过基层建设组织——铺设天然气管道综合流水作业线在改行集体承包制情况下取得的惊人结果。必须在一系列更容易评价结果的工业企业，如矿山、伐木场，试行这一经验，然后再在其他部门的企业推行。

为了改革工业管理体制，将现在的三级管理体制向二级管理体制为主过渡具有重大意义。这项工作正在各机器制造部积极进行。这些部已经撤消了绝大多数全苏工业联合公司（中级管理环节），而生产联合公司和企业直接隶属于部的中央机构。

这项管理体制的改革包括组建新的生产联合公司和将辅助企业交由工作有成效的联合公司管辖。

苏共中央（1985年）六月会议提出的有关工业各部门科学与生产一体化的任务的意义怎样估计都不过分。大部分部门研究所过去是脱离生产的，其中许多研究所的编制里甚至没有设计处和作业室，现在则陆续转入科学生产联合公司，其中每个联合公司都应成为本部门科学技术进步的基地。比如机器制造业就计划成立150个新的科学生产联合公司。

白俄罗斯铁路部门在实行新经营体制之后，已经取得了极好的效果。那里一年腾出了12 000人，使一年里劳动生产率提高到这个部门在整个五年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程度。我们认为，俄罗斯联邦10个汽车运输公司在试验过程中也取得了极其有意义的结果。这些单位已杜绝虚报现象，使汽车运输工作者明确了更好地为用户服务的目标。在试验的这一年里，服务质量提高了，油耗减少了18%。的确，这些单位全部汽车的使用统计指标在许多情况下恶化了，但这毫不奇怪。要知道，在试验的这一年里已经取得了实际的报告资料，而在过去年代，这样的资料是在虚报情况

下编制出来的。

生活服务业也在进行试验。不久前我曾去过爱沙尼亚，并参观了塔林一家从事维修电视机的企业。电视机维修者和制造者之间的新的合同形式使人们对劳动结果非常关心，从而使这些服务行业能更加充分地满足主顾的需要。

党的二十七大规定了进一步改造整个管理与经营机制的途径。没有必要再重复这些规定，因为它们已被我们经营管理干部热情地接受了。现在的任务是使业已规定的方针具体化，并逐步地向着将会保证解决党提出的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任务的完整管理体制过渡。

(原载苏联《经济和工业生产组织》
杂志1986年第6期； 刘悌和节译)

经济生活的核心

(阿巴尔金答记者问)

这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新任所长Л·И·阿巴尔金同苏联《经济与工业生产组织》杂志两名记者的谈话。谈话涉及了一些有关苏联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代表性。（下文“问”代表记者，“答”代表Л·И·阿巴尔金——译者注）

问：在当前改造经济和经营机制的条件下，依靠科学从未象现在这样显得重要。在党的二十七大上谈到，要从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用新的眼光看待某些理论概念和观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社会主义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商品货币关系如此等等。

答：是的。现在迫切需要把这些最复杂的问题弄清楚。我们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部优越性同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确立联系起来看，这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为高效率经济创造了前提条件、经济可能无危机地向前发展等等。在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已经指出，社会主义所有制有着丰富的内容，它本身包含着我国人与人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在利用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问题上的一整套经济利益。这一套复杂的关系要求进行一定的结合和经常调整，尤其是它是处于运动过程之中。

不从理论上深刻认识公有制的实质就不能理解现实的经济进程，就不能采取正确的、符合实际的解决办法。众所周知，经验

主义的办法和错误尝试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认为个体所有制会阻碍当代生产力的发展，而公有制才能为生产的发展创造广阔的天地，我想今天仅仅局限于这种一般的、无疑是常规的见解已经不够了。生活表明，公有制本身不能保证取得成就，而且在公有制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还能在生产力发展掌握科技成就的道路产生障碍。

例如，在70年代后半期，国民经济中开始出现困难，经济增长率显著下降。用于积累和消费的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1961～1965年为5.3%，1976～1980年为3.9%，工业产值相应为7.4%和4.4%。80年代初，这种不良趋向加剧了。1982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减少到3.5%，而工业产值减少到2.9%，实际上居民的实际收入没有提高，国民经济中先进科技成果的采用明显放慢，这影响了完成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

我说这些是为了强调，在实践中我们社会制度的经济基础和具体的经济与社会结果之间的联系是复杂的和间接的。为了充分地得到实现、表现自己，公有制应当有多种形式，而且这些形式必须经常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生活条件，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就是说所有制形式要及时随其一起共同变化，否则实现公有制的形式就会从刺激进步的因素变为阻碍进步的力量。

问：您是否分析了最近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出现的情况才得出如此重要结论？

答：不。我国已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在30年代和40年代之交（当时在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确立了公有制），经济发展速度突然下降，采用先进技术的状况显著恶化，基本建设长期停顿……也就是说，当时的情况和现在很相似。在1941年2月举行的党的第十八次代表会议上对这种状况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摆脱困难的措施。然而战争以及战后恢复经济工作妨碍了弄清这些情况。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是个别现象，是局部问题。后来人们便

慢慢将其忘却。

但是，到60年代初，这种情况又重新出现。当时已成倍增长了的生产力遇到了某种障碍。1965年3月至9月通过的各项著名决议（这些决议是经济改革的开端，后来又被苏共二十三大所确认）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加速器。1966～1970年这个五年计划的经济指标好于后来的所有五年计划（用于消费和积累的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7.2%，工业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8.7%）。

问：您使用了某种障碍这一提法。

答：是的，因为当时经济学家们没有做出充分的总结，并且也没有努力从理论上深刻解释所发生的情况。现在，当第三次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显然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个别现象。如果我们今后在完善实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经济形式方面停滞不前，那么类似的现象就不可避免还会出现。现在需明确地回答下列问题：什么时候、在什么条件下和正是生产关系的哪些环节（分支）开始制约社会经济进步？为加速社会经济进步需要具体做些什么事情？

我还想请你们注意一个原则性的立场，它在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在代表大会的发言中和在苏联共产党党纲新修订本中都有反映。直到现在，经济中的很多消极现象都被认为是非经济原因造成的，譬如说，由于不利的人口因素使劳动力增加量减少，收成不好基本上归咎于天气不好，矿产资源开采量下降是由于开采这些资源的条件恶化。的确，有时在历数这些原因时也补充说，在教育工作中也有错误，在计划工作中有失误以及某些其他原因。但是，所有这些原因都在经济生活范围之外。党的二十七大强调指出，国民经济是加速发展还是速度放慢首先是由经济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是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核心——公有制——是取得进步的强大加速器，但这要有一个条件，即不断对其进行完善。

关于实现公有制的经济形式还有思想方面的问题。可以说，在西方人们用放大镜来看我国遇到的困难，这并不是什么秘密。他们得出结论说“公有制要跨台了”。在分析所有制的全部内容及其外部表现形式的时候，人们不难看清这种论调的荒谬性。公有制做为社会主义的特征不可能成为经济中出现消极现象的原因。我再重复一遍，只有当实现公有制的具体形式与所有制本身和已经变化了的经济生活条件不相适应时经济中才会出现消极现象。这就要求恢复适应性。

问：您非常详细地谈了实现公有制的形式需要做什么，但是还没有指出这些形式是什么。

答：科学上实现公有制的形式问题还是一个比较新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还研究得不够。我不自以为做了圆满回答。可以说所有制首先是在社会产品和社会产品的各个部分的运动中加以实现，其次是在经营管理的具体形式中，如经济核算、劳动报酬、价格和税收制度、净产品和利润的分配制度中加以实现，第三是在社会劳动集体和个人的收入中加以实现。所有制的运动总是以经济利益间接地表现出来。在这当中分配关系占居非常重要的地位。

问：我国的分配政策需要完善。它应当保证为很快提高人民福利和巩固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创造最有利的条件。这是一个大问题，需要单独、认真地谈谈。现在我们想请您谈谈关于经济思维问题：它是否会使社会关系发生形变，其中包括分配关系？

答：看来思维是第二位的，但它总是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的作用急剧增大，因为计划经济是有意识管理的经济。在苏共中央的政治报告中强调指出，完善经济机制需要从改造已形成的僵化思想开始，这并非偶然。在党的文件中确定了完善经济思维的主要要求——科学性、现实主义、面向集约化、面向增长的质量因素、综合解决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任务。

我认为，正是由于经济思维的惰性造成我们经营的混乱现象。你们想一想，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决定社会生产的目的和意义，其总方针就是为了人的福利。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有时有意无意地把手段当做最终目的。于是，不是人们的具体需求，而是以年终总结报告作为生产的目标，而且又要求超额完成。把人的需要藏匿于“生产需要”的背后是非常迷惑人的，这样把自己的日常决定和行动同最终结果（满足需求）相比较就更加复杂。这种对生产目的本身过时的心理观点说明惰性的力量。这种惰性力量会促使人们追求高产值并在新的条件下产值又向生产提出完全另外的任务。我们往往已经不再需要“更多的产品”，而需要的是“更好的产品和降低消耗”。尽管追求总产值、追求产量指标的行为是受指责的，但实际上我们怎么也下不了决心彻底与其决裂。

在现有的生产组织结构条件下，当部门利益自动地同国民经济利益混为一谈的时候，另一种坏的思想也是不可避免的。在政治报告中谴责了这种立场，指出保证使全民利益对部门和地区利益占绝对优势，保证使整体利益对任何地区利益占绝对优势是经济上实现公有制的最重要方针之一。

实际情况如何呢？以黑色冶金业为例。黑色冶金业的工作是按增长速度、按产值计算的产品产量等指标来评价的。计算最终产品产量时，比如钢材还要加上全部内部周转额（中间产品）。结果，扩大内部周转额就成了部门工作的效率指标，而且有权得到刺激。

但要知道，这是不对的。按向协作部门提供产品的情况、满足消费者订货的情况来评价部门的工作才是适宜的。也就是说，列入计算的不应是全部，比如说生铁，而只是用生铁冶炼出来的向协作部门的消费单位提供的那一小部份产品。你们的内部周转（炼出的生铁、钢的数量）与任何人无关，这是你们内部的事